

■知无不言

西方经验与理念 岂能作为当然目标

迄今只去过一次孔子故里。至今仍难忘怀的，是气势恢宏的孔庙里被中国人自己破坏的文物，尤其是自汉代以来遗存下的1044块碑刻，大多数被摧残折断，向当今与后世永远敞露着横七竖八的伤痕，实在令人痛心。

曾经天真地以为，通过物质的摧毁就能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分开，从此就会告别可恨的“传统”而一步登上“现代”。可谁知，“抽刀断水水更流”，中国越是改革开放，物质财富越是增长与宽裕，中国人们越想从人文精神上去“寻根”，“传统”不仅在供给人们进步的营养，并且还在彰显对世界的积极意义。

不是吗？对以《论语》为代表的古典作品的通俗解说，如今成了人气极旺的畅销书，以各类中国历史题材为蓝本的影视文学作品，越来越兴盛；大街小巷，人们以寻求诸如“唐装”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特色的服装为“时尚”；“孔子学院”越来越多地扎根世界各地。

近十多年来社会现象、思潮的反向变化，有非常值得细细研究的内容。自19世纪起，中国落后了。落后的结果，就是那么多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与割地赔款，而中国人尤其是知识界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变面前，把历代祖先创造与传承下来的文化看作是落后的原因。于是乎，就使劲批“传统”，“精英”们纷纷与“传统”划清界线，忙不迭地向世人表明惟有西方文化观念与经验才是“主体”，才可以“救中国”。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前，对各类文物古迹，在外来强盗破坏的同时，国人也加入摧毁的行列，有些甚至比洋人表现得更凶猛。

随着中国各界与西方交往的增多，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盛，信心渐渐恢复，中国传统元素也在慢慢恢复，知识界中头脑清醒的学者面对西方文明开始运用学习与批判的工具，在探讨中国发展与复兴问题时，关注起了避免“现代化框架”束缚与误导的问题。

不容否认，仍然弥漫在当今的强烈气氛，是不少学者与决策者在研究和决策时，总是去寻求西方经验与思想观念的支持，凡是在西方经验中找不到的，或即使西方经验中曾经有过但现在已不再有的做法，就被认为不可取；凡是不符合西方思想观念中的理论，就被断然认为是落后的，没有解释力的。换言之，就是将西方经验当作即时的“当然目标”，将西方的已有理论当作“当然的思想前提”。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框架”的束缚与支配。

这一束缚与支配相当厉害。正如邓正来教授总结的那样：“‘现代化框架’的被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性的‘暴力’；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学人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应当的；它使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此一思想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现代化框架’对这些研究‘语境化’或‘路径化’处理，进而使这些研究成果带上此一框架的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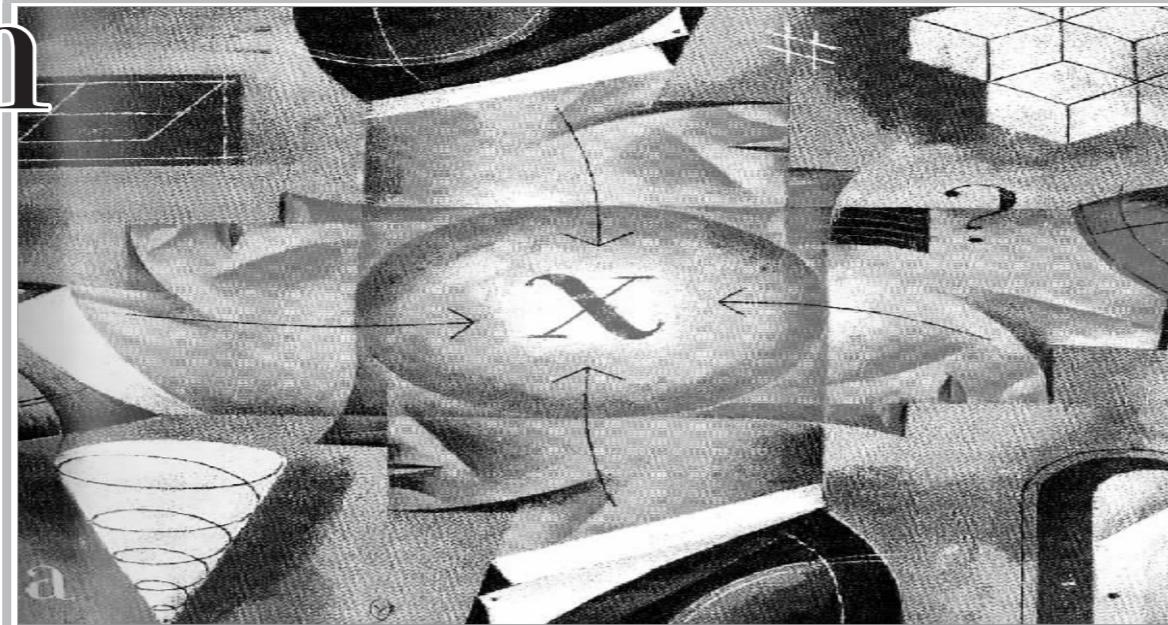
问题是，这一“现代化框架”本身具有着极大的谬误，因而就有不可忽视的误导效应。且不说，这一思想框架是以“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两分观”为前提的，而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绝对截然分离的“两分观”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传统中孕育着现代，而现代中亦蕴含着传统，历史不可分。仅就全场景世界发展历史看中国，中国的强盛史达数千年，不能仅以近代这两百年历史就断然否定了几千年强盛史中形成的中国经验、思想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领先世界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强而无欺、威而不霸，透着“一个伟大国家与民族的气度与底蕴”，这又迥然不同于两百多年前才起家的“现代国家”。

明朝时的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当时的大明朝，是世界的强盛领先者。郑和的庞大船队也绝对是当时的“航空母舰群”，既有主力舰，又有专门用于运输的船舶、用于作战的战船，而且郑和率领的将军士兵达28000多人。这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浩浩荡荡的航海力量，经东南亚和印度，远到非洲，前后七次，没有霸气、掠夺、战争与鲜血。而在1431年郑和结束其最后一次远航的60多年后，仅区区带领着四艘船的葡萄牙人达·伽马，同样到了印度，却到处抢掠财宝，到处竖立标榜表明自己的所谓主权，硬是将别人居住几千年的地方说成是自己的。此后，西方的殖民者就是遵循如此强盗逻辑在海上四处出击。诚如南非一位政治家所讲：“西方人刚到我们面前时，手中拿着圣经，我们手中有黄金，后来就变了，他们手中拿着黄金，我们手中拿着圣经。”

试问，为什么西方的经验与思想观念是我们探讨与实践中国发展与复兴的当然目标、路径与思想前提呢？我们占世界文明史绝大部分时间的强盛史所积累的经验与思想观念，就不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继承吗？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探求中国发展与复兴的当代，实在不能丢了祖宗、传统与自我，岂能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放弃了公平教育，中国也应不再强调与实施公平教育呢？真正的学者、实践家与开创者无一不是那些能够跳出支配与束缚了几代中国人的“现代化框架”的人。要知道，只有一种光，无论如何是形不成彩虹的。无论哪种文明哪种传统，都孕育着现代与进步。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各种文明与传统的共存共荣。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谎言晚论

股市调控 宜在泡沫初泛之时

中美已成为真正唇齿相依的国家，伴随大牛市而来的泡沫危机将无法阻挡到来，为了收入分配公平与社会的和谐，为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政府宁可选择股市泡沫，也不能选择房地产泡沫。

2007年2月27日的“黑色星期二”将被记入中国股市。沪深两市双双创下1997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成交2003亿元，创出历史新高。受中国股市影响，美国股市几个小时之后也暴跌。道·琼斯指数盘中曾一度下跌545点，是美国股市自“9·11”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据分析师们的推断，中国沪深股市大幅下挫、美国耐用品订单数据令人失望及伊朗和阿富汗局势不确定性的加剧，使得人们担心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放缓，加上美国股市已经上涨好一段时间，引发了华尔街的这次大跌。

更大的可能性是，伴随着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国际超级流动性的背景下(据麦肯锡最新报告，目前全球金融资产已达140万亿美元)，全球资金继续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的资产泡沫将加速膨胀，直至达到危险的高度。

据分析师们的推断，中国沪深股市大幅下挫、美国耐用品订单数据令人失望及伊朗和阿富汗局势不确定性的加剧，使得人们担心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放缓，加上美国股市已经上涨好一段时间，引发了华尔街的这次大跌。

显然，不仅从中国股市，也可以从中美的巨大贸易量、资本流入流出关系，中国巨量购买美国国库券等更多的地方看出，中国已成为足以影响全球经济的大国。今天，中美已成为真正唇齿相依的国家。不过，沪深股市与美国股市显现出如此直接的相关关系，还是让所有的预测者吓了一跳。

事实上，如果从更长的时段来看，这个世界的变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国的变化，而中国的变化从今后一段时期看，会体现在股市的风云变幻上。因此，从宏观上探究中国股市的变化，是理解当前中国股市乃至世界经济变化的重要角度。

笔者相信，伴随大牛市而来的泡沫危机将无法阻挡地到来。这意味着，无论是股市还是楼市，只要是与人民币相关的资产，都将大涨，并泛起大泡沫，其程度将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并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空前。对于正在形成的历史上最大的资产泡沫，笔者忧心忡忡。

泡沫的形成与三个因素有关：

中国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全球超级流动性集中

于中国。
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非理性繁荣形成的基础。如果在考虑到中国工业化升级的同时，还伴随着至少15年的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那么，可以预料中国的高速增长大概还有20年，而在此前的若干年，比如说2005年到2010年的5年间，会是增长特别快的几年。这意味着即便到2008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很难止步，所谓2008年大限，2008年将出现泡沫崩盘的说法难以应验。

更大的可能性是，伴随着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国际超级流动性的背景下(据麦肯锡最新报告，目前全球金融资产已达140万亿美元)，全球资金继续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的资产泡沫将加速膨胀，直至达到危险的高度。

其二，在此过程中，是将泡沫引向房地产还是引向资本市场？笔者建议，应该控制房地产的资产泡沫、相对放宽资本市场的资产泡沫。因为在我国，房地产泡沫的特点是，收益只能被少数人所获得，大多数人则沦于被抢夺的地步。因此它是一种“掠夺型”收益分配。房地产泡沫带来的城市畸形繁荣，城市化超越工业化，从而对于工业化的完成起到阻碍作用。股市泡沫则不同，其收益被多数人所分享，因此是分享型收益分配。股市泡沫的结果是大量资金流向工业领域，从而有利于中国工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所以，从收入分配与社会和谐的角度考虑，股市泡沫要比房地产泡沫的危害小些。因此，政府宁可选择股市泡沫，也不能选择房地产泡沫。

前年，政府调控房地产，是想调控过热的经济，同时控制泡沫风险；去年，政府调控房地产，除了想稳定房价外，主要是想建立住房社会保障，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有效住房供给。然而，就在此时，中国的资本市场悄然启动，股市泡沫初步形成。今年及今后几年，无论是房地产还是资本市场，泡沫势必越来越大，政府调控的风险也将越来越大。如何在不破坏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前提下避免大的资产泡沫危机，平稳地推进中国工业化的升级与城市化的进程，将成为中国政府最大的挑战，而“两手”之间的博弈以及对世界的影响也必然会越来越精彩。

假设泡沫无从避免，那么，中国政府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其一，及时调控股市，不能等到泡沫已变得不可收拾再去调控。为了让市场变得理性，无论是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调高利率，向商业银行发票据，还是出台其他各种有效的降低流动性的措施以及“吓唬”的办法，都可以考虑。如果泡沫的生长变得缓和，最终将能使经济更加持续、健康、理性地增长。

许多人都在争议说，沪深股市泡沫并不大，那就对了，这恰是宏观

调控的最佳时机。许多人也在讨论说“黑色的星期二”并不存在明显利空，这也对了，因为没有利空就是最大的利空，意味着政府必须动手的时刻已经来临。在经历了一年的股市大牛后，2007年将是股市的调控年。政府的调控之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博弈，将使股市涨跌跌宕。泡沫除去，市场渐趋理性后，换来的是更加健康和持续的股市增长。

其二，在此过程中，是将泡沫引向房地产还是引向资本市场？笔者建议，应该控制房地产的资产泡沫、相对放宽资本市场的资产泡沫。因为在我国，房地产泡沫的特点是，收益只能被少数人所获得，大多数人则沦于被抢夺的地步。因此它是一种“掠夺型”收益分配。房地产泡沫带来的城市畸形繁荣，城市化超越工业化，从而对于工业化的完成起到阻碍作用。股市泡沫则不同，其收益被多数人所分享，因此是分享型收益分配。股市泡沫的结果是大量资金流向工业领域，从而有利于中国工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所以，从收入分配与社会和谐的角度考虑，股市泡沫要比房地产泡沫的危害小些。因此，政府宁可选择股市泡沫，也不能选择房地产泡沫。

前年，政府调控房地产，是想调控过热的经济，同时控制泡沫风险；去年，政府调控房地产，除了想稳定房价外，主要是想建立住房社会保障，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有效住房供给。然而，就在此时，中国的资本市场悄然启动，股市泡沫初步形成。今年及今后几年，无论是房地产还是资本市场，泡沫势必越来越大，政府调控的风险也将越来越大。如何在不破坏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前提下避免大的资产泡沫危机，平稳地推进中国工业化的升级与城市化的进程，将成为中国政府最大的挑战，而“两手”之间的博弈以及对世界的影响也必然会越来越精彩。

■求索

一流人才应该留哪里？

——“漫走在早稻田”之三

刚来日本时，我很奇怪为什么出租车司机几乎是清一色的老人。后来，同事给我解开了这一疑惑，他们都是退休后在家闲着没事，再加上退休金比较少，所以出来开出租挣些家用。在日本开出租是个清闲的活，收入不高，晚上地铁关闭之后，生意才有些起色。老人有了这些收入，就能与日本社会的平均水平持平。在日本的超市，基本上都是些50多岁的老大妈在当营业员。

这些现象都与中国现状差别很大，因此引发我对工资结构、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的思考。

或许我们大家对垄断行业高工资危害性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社会的公平感和正义感之上。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若长此以往，很有可能会扼杀整个社会生产发展动力。

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安德瑞·史莱弗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维什尼认为，人才的流动是沿着工资的方向往上走的。如果高工资行业是那些富有创新潜力的高科技行业，那么高素质的人才集聚之后，会大大增强这些行业的科技研发能力，形成一个创新性很强的社会结构和持续的经济发展态势。信息产业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的例子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点。如果将高工资配置给垄断行业，将形成一个典型的寻租性社会，稍有能力的人都想挤入其中，社会上再也无安心投资生产之人，大家都想从寻租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而配置在寻租性行业高素质的人才，凭借聪明才智会设法增加寻租机制，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生产机制由此将陷于瘫痪，整个社会则往一个更差的均衡点演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则用俄罗斯转型改革来论证这种危险性。根据俄罗斯“私有化之父”安纳托利·丘拜斯等人的“伟大构想”，一旦那些还没有界定清楚的巨大社会财富私有化了，就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中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一夜之间获得财富的富人，出于利益需要很可能可能会延伸出各种法律制度，从而使得“大爆炸”之后的俄罗斯重回法治的稳定社会结构。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些精英还想找到更好的出路，他们一方面通过和地方政府勾结获得更多的特权，或者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优良的石油开采权等等，而另一方面他们则绕开外汇管制把大量的财富转移到国外。这就是当代精英治理下的俄罗斯现状。资本家致力于更大的特权和财富转移，更多人企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涌入到寻租行业中，或者是挤入能源部门。由于这些人才的流出，俄罗斯在国际军火和技术出口市场上开始走下坡路。是这几年火爆的国际石油市场才挽救了俄罗斯的经济。

那么，什么样的工资结构是最合理的呢？最优秀的一流人才应该配置在哪里呢？

按照当今一种公认最佳的社會人才配置结构，一流的人才应该留在企业，因为那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动力源；二流的人才则留在大学，因为教育同样关乎国家的长期发展；三流的人才留在政府和各种公共事业部门。这太有悖于中国的精英社会治理思维。

把一流的精英人才留在公共部门是一个机遇，更是一种危险。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美国是当今世界格局中百年屹立的霸主。它长久不衰的经济增长奥秘在相当程度上就在于有一个庞大的精英体系在支撑着它的经济体制，使其拥有良好的国家创新能力，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多多。而美国的大学和政府机构则未必集中着最顶尖的人才。前几年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个搞恶的FLASH笑话，大意就是说小布什的智商是历届总统中最低的，但就是这样的政治领袖却引领着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没有在企业界从事科技和市场开发的一流精英在支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战后的日本则是另一类型的社會结构。注重团队合作精神的日本人非常强调收入的平均化，一个从事计算机研发的技术人员与同年龄段的清洁工之间的收入差别可能并不会大。我在早稻田大学的工资收入，就相当于同龄日本人的中等工资收入，不高也不低。这样的报酬结构，导致人才流向每个部分的人数基本上一致。日本人引以自豪的“一亿中流”社会可能并不是最佳，但也不是最坏的。可以说，日本的经济的确很强大，但要成为一流强国，可能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除了历史、地缘政治的关系，就是因为日本的工资结构决定了它不太可能有太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发展。

毫无疑问，高收入把社会的大部分精英都配置在服务性的公共部门或者各种垄断行业之中的倒挂社会结构是极度危险的。那些精英既有创造出经济奇迹的能力，同样也有摧毁经济的能力，而且他们的摧毁力要比一般人更加强。因此，腐败、贫穷、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等等都是这一类型社会结构的常态。我们不能不担心，如果任垄断行业高工资发展下去，会不会将转型的中国引向倒挂的社会结构，扼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使得改革事业前功尽弃呢？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合理的呢？最优秀的一流人才应该配置在哪里呢？



按照当今一种公认最佳的社會人才配置结构，一流的人才应该留在企业，因为那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动力源；二流的人才则留在大学，因为教育同样关乎国家的长期发展；三流的人才留在政府和各种公共事业部门。这太有悖于中国的精英社会治理思维。

把一流的精英人才留在公共部门是一个机遇，更是一种危险。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美国是当今世界格局中百年屹立的霸主。它长久不衰的经济增长奥秘在相当程度上就在于有一个庞大的精英体系在支撑着它的经济体制，使其拥有良好的国家创新能力，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多多。而美国的大学和政府机构则未必集中着最顶尖的人才。前几年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个搞恶的FLASH笑话，大意就是说小布什的智商是历届总统中最低的，但就是这样的政治领袖却引领着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没有在企业界从事科技和市场开发的一流精英在支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战后的日本则是另一类型的社會结构。注重团队合作精神的日本人非常强调收入的平均化，一个从事计算机研发的技术人员与同年龄段的清洁工之间的收入差别可能并不会大。我在早稻田大学的工资收入，就相当于同龄日本人的中等工资收入，不高也不低。这样的报酬结构，导致人才流向每个部分的人数基本上一致。日本人引以自豪的“一亿中流”社会可能并不是最佳，但也不是最坏的。可以说，日本的经济的确很强大，但要成为一流强国，可能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除了历史、地缘政治的关系，就是因为日本的工资结构决定了它不太可能有太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发展。

毫无疑问，高收入把社会的大部分精英都配置在服务性的公共部门或者各种垄断行业之中的倒挂社会结构是极度危险的。那些精英既有创造出经济奇迹的能力，同样也有摧毁经济的能力，而且他们的摧毁力要比一般人更加强。因此，腐败、贫穷、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等等都是这一类型社会结构的常态。我们不能不担心，如果任垄断行业高工资发展下去，会不会将转型的中国引向倒挂的社会结构，扼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使得改革事业前功尽弃呢？

■一言难尽

凯恩斯笑容背后那块碎玻璃

谁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古人当推老子。《老子·五十八章》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今天，我看没有比经济学家更乐观的了。当大多数学者呼吁，无论科技文明再怎么进步，人类都应该保持敬畏自然的“传统美德”，可每当灾难肆虐时，总会有一种声音义正辞严地声称“灾害有利”。发这种声音的，通常总是经济学家。

一个较近的例子发生在美国。一年多前，当扬长而去的“卡特里娜”席卷了2000亿美元，使美国失去了40万个就业机会，而当热带风暴“丽塔”正在转变成飓风，徘徊在生产石油的墨西哥湾，新奥尔良市掀起新一轮“灾难大逃亡”，美联储却“固执地”持续着它的新一轮加息周期，全然不顾飓风屡屡肆虐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虽然“卡特里娜”可能使美国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率下降0.5%至1%，但是J.P.Morgan的高级经济学家Anthony Chan相信，长期而言，飓风将刺激整体经济发展，因为受灾城市需要大量的清理和重建工作，这意味

着未来12个月内，将产生大量的职位空缺，而这对经济有利。

还有经济学家说，“从个人的角度看，人身伤亡是悲剧；但从经济影响角度看，我们的研究表明飓风将转变成天赐的工程。”

经济学家的此类主张，几乎所有的依据都源自所谓的“破窗理论”。

一个小坏蛋打破了一家面包店的一块玻璃，然后溜走。路人见状开始争辩，说这将带给玻璃业者生意机会，玻璃业者赚了钱去买可乐又带给可乐生产者生意机会，可乐商又可能去买鞋，如此推论下去，这小坏蛋的破坏将带给社会许多的生意和就业机会。结论是：社会应该表扬这小坏蛋对社会的“贡献”！

这样一种谬论，却很难找出学理上的破绽。更加不幸的是，“破窗理论”与凯恩斯宣扬的乘数理论（始作俑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卡恩）如出一辙。

凯恩斯雄辩地指出，政府增加一笔购买，就像投入到湖面的一粒石子一样，将引起一连串生产和收入的增加，结果GDP将会扩大若干倍。当然，企业

增加一笔投资，消费者增加一笔支出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因此，假如凯恩斯先生看到飓风吹倒房屋、洪水冲坏桥梁，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在他的脸上出现笑容。比如，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氏写道：“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并把这些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在已开采过的矿井中，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人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挖出来，那么，失业问题就不会存在，而且，在此推动下，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很可能要比现在多出很多。……挖窟窿总比什么都不做好。”进而，他甚至说：“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么，造金字塔、地震甚至火灾也可以起着增加财富的作用。”

可是，战争和地震真的能增加财富吗